

# 略論魏晉文人名士之任誕行爲

——兼述魏晉時代飲酒·服食之風

金 卿 東<sup>\*</sup>

---

◁ 目 次 ▷

I. 前言	Ⅲ. 魏晉文人名士任誕行爲之內涵
Ⅱ. 魏晉飲酒·服食之風及其原因	1. 任誕行爲的精神支柱
1. 魏晉飲酒之風	2. 任誕行爲與服食·飲酒之關係
2. 魏晉文人名士之飲酒原因	3. 任誕行爲的真實意義——反禮教·任性情
3. 魏晉服食之風與其原因	4. 任誕行爲之質變
4. 服食的禁忌及其附帶現象	Ⅳ. 結言

---

## I. 前言

魏晉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重大變化時期，無論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整個意識形態，都經歷轉折。魏晉人在意識形態中最大的變化，在於其對人性的自覺。魏晉人由於有了人性的覺醒，因而重視個人的本性生活，要求一種人生自然化的解放生活；反對人生倫理化的違反本性。<sup>1)</sup>這種人生觀，產生一個特別受到注目的士風。所謂「士風」，牽涉到兩個不可截然劃分的方面：一是知識分子(即所謂「士」或「士大夫」)之思想，一是其行爲。就思想而言，其特色是易·老·莊的三玄之學代替了漢代的經學；就行爲而言，其特色則是突破傳統禮教的藩籬而形成一種「任誕」的風氣。<sup>2)</sup>

此外，魏晉在行爲上的士風，尚有飲酒·服食行爲，乃當時士大夫階層所流行的一種生活習慣。「任誕」行爲與「飲酒」·「服食」的生活習慣，就行爲表現的外緣而言，則有某種關係，故本論文擬就魏晉士風分爲三方面，即飲酒·服食·任誕行爲，來加以討論。

---

\* 成均館大 中語中文學科 助教授

1) 參見劉大杰《魏晉思想論》·〈第五章·魏晉時代的人生觀〉部分。

2) 見余英時《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頁三二九；收於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

## II. 魏晉飲酒·服食之風及其原因

### 1. 魏晉飲酒之風

飲酒是一種大為普遍的享受，古今中外，都是一樣。中國自上古以來至魏晉前，飲酒風氣，已經大為普遍，原無特別講述的必要，但魏末的竹林名士，常因飲酒而失常性，做出頗多怪異言動。至於稍前的孔融，且因飲酒問題，而間接伏下日後殺身禍根，因而文人名士與飲酒之關係，也就不可忽視。

《後漢書·孔融傳》云：「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恆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是年饑兵興，曹操令禁飲酒·釀酒，他不滿曹操禁酒，常與辯難，今孔融集中有〈難曹公制酒禁二表〉，皆措辭激昂，為飲酒辯護，其第二書云：「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意思是說，沈迷女色，足以亡國，為何不禁止結婚？借此反證酒也不應禁止，這使曹操積嫌成怨，終自借端枉狀棄市。孔融本為慷慨高才之士，却因好酒，而專與曹操為難，未懂養晦韜光，遂陷殺身滅族之慘。其實曹氏父子與當時所謂八俊之一的劉表等，也是非常好酒的，曹操詩「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三國志·魏志·曹植傳》亦謂曹植「飲酒不節」，又曹丕〈典論·酒誨〉云：

荊州牧劉表，子弟驕貴，並好酒，為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中雅，受六升，小曰秀雅，受五升。又設大鍼於杖端，客有醉酒寢地者，輒以刺之，驗其醉醒。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

由此可見漢末文人名士飲酒風氣之盛，飲酒風氣之盛雖始於漢末，但一直到竹林名士，酒才幾乎成為他們生活的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徵。《世說新語·任誕篇》云：「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注引《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內，至于今詠之。」其中更有因飲酒成狂者，如阮籍·劉伶等便是。《世說新語·任誕篇》云：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

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晉書·阮籍傳》云：

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

而且劉伶，常乘一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鋤相隨，說：「死便埋我。」（《晉書·劉伶傳》）他們嗜酒的程度及沈湎飲酒的情形，由此可得而知。

至於與阮籍並稱「嵇·阮」的嵇康，亦好飲酒，《世說新語·排調篇》云：「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又《世說新語·容止篇》云：「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竹林七賢，除劉伶·阮籍·嵇康外，尚有山濤·向秀·阮咸·王戎等四人（並見《世說新語·任誕篇》及《晉書》本傳），亦無不好飲酒者，在此不必一一贅述。

飲酒實在是竹林名士生活的共同特徵。他們的飲酒生活，對當時或後世士林的影響甚大，因此之故江左名士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孰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世說新語·任誕篇》）「痛飲酒」便成爲名士條件之一。魏晉文人名士，如山簡·呂安·張翰·畢卓·王恭·阮孚·阮修·王濛·劉惔·陳暄·謝幾卿·謝鯤·張湛·胡毋輔之·光逸·王忱·袁伊·郭象·王衍·桓伊·鄭泉·孔群·周顛·陶潛等，都莫不以好酒出名。足見魏晉飲酒之風盛行的情形。

## 2. 魏晉文人名士的飲酒原因

酒是一種具有麻醉性的飲料，因此，歷代文人大都把它當作解憂消愁的東西。曹操云：「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短歌行》）陶潛云：「酒能祛百慮。」（《九日閒居》）李白云：「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將進酒》）杜甫亦云：「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愁。」（《落日》）對他們而言，萬慮泯滅於樽前，一醉能解千愁，「忘憂物」就成爲酒的代名詞。然而，魏晉文人名士的好酒，似乎不純爲解憂消愁，他們另有更爲嚴肅的理由以及更大的慾望。

每當朝代的更換，政局多變，文人名士往往遭禍，魏晉之際，尤其在司馬氏的專權之下，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於是文人名士都紛紛相率的只為避災禍，以求苟全性命之道。魏晉之際，為保全性命而飲酒者，可以阮籍代表之。《晉書·阮籍傳》云：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阮籍的這種飲酒，是為實際的社會情勢所逼不得已的，自然與孔融「坐上客恆滿，尊中酒不空」(《後漢書·孔融傳》)之類的飲酒，其旨趣大不相同。在政治混亂·社會黑暗的情形之下，阮籍不能採取積極的行動來反抗司馬氏的專權，也不得走上離俗隱逸的路。他為了避免政治上的危害，保全生命，而只得藉飲酒作為韜光全身的手段。這類飲酒是對現實的不滿和迫害的逃避，<sup>3)</sup> 具有保身的具體目的。故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客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陳平·曹參以來用此策……流傳之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為例，濡首腐脇，亦何恨於死邪。」這可算是知言。

自漢末以來，人們逐漸注意到生死問題，深切地感覺到時光飄忽和人生短促的悲哀，這種對生死問題的自覺，給人帶來及時行樂的人生態度。持有這種人生態度的人們認為官能的快樂是人生的本性，所以要肆情縱慾以樂生，反對為名利所累。<sup>4)</sup> 這種及時行樂和肆情縱慾的人生態度，正可視為由漢末以來文人名士縱酒行為的一種理論的說明。<sup>5)</sup> 據《世說新語》所記，則有「江東步兵」之稱的張季鷹，答覆勸他為身後名打算的人說：「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中興名士畢卓常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導告訴他：「不見酒家覆餗布，日月久糜爛邪？」他竟然回答說：「不見糟中肉，乃更堪久。」過江後周顛經常狂飲，嘗三日醒，

3) 見王瑤《中古文人生活》中《文人與酒》一文頁五八~五九；收於《中古文學史論》

4) 見劉大杰《魏晉思想論》·〈第五章·魏晉時代的人生觀〉部分

5) 見王瑤《中古文人生活》中《文人與酒》一文頁四九；收於《中古文學史論》

時人稱之爲「三日僕射」，名士王忱更是連月不醒，自嘆「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以上皆見於〈任誕篇〉）對這些名士而言，飲酒只是享樂與麻醉的工具而已，已經「失却解憂的積極意義與保身的具體目的。」<sup>6)</sup>

魏晉文人名士的飲酒，另有一種原因，值得我們注意，到了魏晉時期，服食風氣，大爲盛行，而服藥後要飲熱酒，以行藥氣。《本艸》云：「酒味苦甘辛，大熱，有毒，主行樂勢，殺百蟲，惡氣注。」因爲飲酒可以幫助散發，可以助成散的效力，所以服藥的人必須飲一點熱酒，雖然不是大量，這類飲酒，雖然與以忘憂或保身爲目的的飲酒有所不同，但是可以說是更大的慾望的表現，也無妨說是魏晉飲酒風氣盛行的因素之一。

### 3. 魏晉服食之風與其原因

中國先秦以前，已有人提倡服藥長生之說，當時的方士，教人求神仙·燒金丹，以求不老不死，屈原楚辭〈涉江〉云：「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以後秦始皇·漢武帝亦有求仙藥·希長生的故事，〈古詩十九首〉亦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大抵秦漢以來，此風益盛，至於魏晉之世，當時人士雖厭世歸隱，但並不惡生樂死，其對於生的慾望，仍是頗爲強烈的，因此服食風氣亦隨之盛行。

魏晉人所謂「服食」，主要是服「五石散」（又名「寒食散」），據唐孫思邈〈千金翼方〉，有「五石更生散」之方，就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鍾乳·石硫等五石，煉製成藥號稱「五石散」，余嘉錫〈寒食散稿〉引皇甫謐〈醫心方〉卷十九云：「凡諸寒食草石藥，皆有熱性，發動則令人熱，使冷飲食，冷將息，故稱寒食散。」可見服五石散，需冷食，所以又叫「寒食散」。

服藥的目的本來在於達到長生不老的企求；長生不老的目的是否可以達到，這要到將來才能得到證明，但是服藥後是有現實效力的，那就是面色比較紅潤，精神刺激得比較健旺。<sup>7)</sup> 據說何晏服「五石散」，心懷開朗，體力增強，而且變爲容貌俊朗，皮膚白嫩，這都可以視爲是「長壽」的一種象徵，而且在魏晉追求「美」的風氣之下，這目前所獲得的效果，正是一個「美姿容」的必要條件。<sup>8)</sup>

6) 見寥蔚卿〈論魏晉名士的狂與癡〉一文：收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散文與論評之部〕

7) 見王瑤〈中古文人生活〉中〈文人與藥〉一文：收於《中古文學史論》

8) 見王瑤〈中古文人生活〉中〈文人與藥〉一文頁二五：收於《中古文學史論》

因此當時很多人也跟着服食，成爲一種風氣。故秦丞祖〈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sup>9)</sup>

#### 4. 服食的禁忌及其附帶現象

五石散(即寒食散)是一種劇毒藥，服用後伴隨毒力發作，服用不當，往往會送命，因此唯服寒食散，禁忌頗多。唐孫思邈〈千金翼方〉二十二云：

凡是五石散，先名寒食散者，言此散言寒食，冷水洗取寒，惟酒欲清熱飲之，不爾，即百病生焉。服寒食散，但冷將息，即是解熱藥，實大盛熱服三黃湯也。

俞正燮〈癸巳存稿〉七亦云：

通鑑注言寒食散蓋始於何晏，又云煉鍾乳硃砂等藥爲之，言可避火食，故曰寒食。按寒食言服者食宜涼，衣宜薄，惟酒微溫飲，非不火食。

由此可知吃用寒食散不但是很危險，要十分小心，而且服用的手續亦相當麻煩，一切都得冷食，只有酒一定要溫熱才能飲用。《晉書·裴秀傳》上有一段記載：「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吃用時必須適當，不然百病纏身，甚至於痼疾而死，裴秀即是不得其法而死。《世說新語》中亦有服散後戒飲冷酒的記載。〈任誕篇〉云：「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鳴咽，王便欲去。」可見社會一般的飲酒習慣是飲用冷酒，但服食後要飲熱酒。服用五石散後有十條禁忌，據余嘉錫〈寒食散稿〉引皇甫謐〈醫心方〉云：

服用有十忌：第一忌曠怒，第二忌愁憂，第三忌哭泣，第四忌忍大小便，第五忌忍饑，第六忌忍渴，第七忌忍熱，第八忌忍寒，第九忌忍過用力，第十忌忍安坐不動。若犯前件忌，藥勢不行，偏有聚結。常自安穩調和四體，亦不得苦讀念慮；但能如是，即終不發動，一切即愈。

9) 《世說新語·言語篇》劉注所引。

所以有這麼多的麻煩事得去留神。晉人所謂「行藥」，即是第十忌，因此服藥後一定要起身行走，不能安坐不動，又稱爲「行散」。其目的，如服食後要飲酒，就是爲了散發藥氣。故通常服藥後，必須步行，不能休息，否則會毒發而死，因而行散成爲當時人服藥後必需的運動。故《世說新語·文學篇》云：「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又《賞譽篇》云：「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甚至於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sup>10)</sup>

「行散」之後，全身會發熱，可能是藥性發作的緣故。況且五石均是能發熱之藥品。發熱以後又將發冷，冷時即脫衣，用冷水澆身。當發悶熱時，也可用冷水洗臉面與手足，過後不得經常洗浴，衣服宜寬大而薄，鞋襪俱不可穿，而改用屐。這是因爲服藥後皮膚幼嫩，容易受到磨傷或刺破之故。<sup>11)</sup>

服食以後所附帶發生的現象，影響到風俗習慣，在此再說一點。魏晉間衣服注重闊袍大袖，質地柔軟。《晉書·五行志》：「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興臺成俗。」《顏氏家訓·涉務篇》：「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宋書·周朗傳》：「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裙之長，可分爲二。」此因服藥的人們，要穿寬袍大袖的衣服，影響至非服藥者亦群相倣效，穿寬袍遂成風俗。魏晉人不着鞋襪而改穿屐的風俗，亦是同樣的道理。《世說新語·雅量篇》云：「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晉書·謝安傳》：「不覺屐齒之折。」《宋書·武帝紀》：「性尤簡易，常著連齒木屐。」《晉書·阮孚傳》：「自臘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能著幾量屐。」謝靈運登山，亦穿屐。可見這也和衣服一樣，是服藥之風盛行之後，跟着彼此倣效而形成的一種風俗。

### Ⅲ. 魏晉文人名士任誕行爲之內涵

10) 鮑照《行藥至城東橋》：「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迥陌，延瞰歷城闈。蔓草緣高隅，俯揚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爭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開芳及稚節，含彩吝驚春。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容華坐消歇，端爲誰苦辛。」

11) 見楊美愛《〈世說新語〉新探——從〈世說新語〉探魏晉之思想社會與亡國》(《弘光護專學報》6期)頁四四。

## 1. 任誕行爲的精神支柱

魏晉時代，在長期紊亂的政治狀態下，儒學逐漸失去支配人心，約束個人的力量，而老莊之學大爲盛行。老莊之學崇尚自然；重視性情的自然流露，鄙薄矯情文飾。因此，對任情放達·不拘禮法的任誕人物而言，老莊思想可以說是他們在任誕行爲上的精神支柱。《世說新語·任誕篇》有云：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識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

《晉書·劉伶傳》說他「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可見他以天地爲棟宇，以屋室爲幃衣的任誕行爲，有其思想的基礎。《晉書·范宣傳》亦云：「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由此可見，當時文人名士對於任誕行爲持有一種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的心態。這種心態無疑是產生於世上老莊的風氣之下。阮籍人生哲學出於老莊思想，有著名的〈達莊論〉·〈大人先生傳〉二篇爲證，其最主要的行爲特徵是曠達而不拘禮法。《世說新語·任誕篇》云：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訖畢，便去。或問裴曰：「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

《文選·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干寶《晉紀》云：「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不但任誕人物自己不以悖禮教放蕩的行爲恥，當時的禮法之士亦認爲阮籍居喪，飲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的任誕行爲是無可厚非的，因爲他是方外人，崇尚自然，不受禮教的約束。

老莊思想可以說是任誕行爲的思想基礎，換言之，則任誕行爲是老莊任自然的主張在文人名士生活中的體現。任誕行爲有了這種思想的基礎作爲精神的支柱，因而容易形成社會風氣。

## 2. 任誕行爲與服食·飲酒之關係

魏晉文人名士的任誕行爲，雖然是以老莊自然思想爲其精神支柱，但是也



不能不承認與當時所流行的飲酒以及服食之風有某種關係。就內緣而言，老莊任自然的主張，爲魏晉人任誕行爲提供其思想基礎；就外緣而言，飲酒與服藥則有引發某些任誕行爲的作用。

《世說新語·任誕篇》一開頭就敘及竹林七賢「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的故事，而且綜觀其五十四條所記載，與飲酒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條目，多達二十條以上，已經充分顯示出來魏晉人放蕩不羈的行爲與其飲酒之間的某種關係。《世說新語·任誕篇》云：

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箸白接；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

魏晉人悖禮放蕩的行爲往往是在酣醉的情況之下所做出來的，其超越常態的飲酒態度和醉態也是一種表現在飲酒生活的任誕行爲。此外，在某種情況之下，飲酒行爲本身便成爲任誕行爲。《世說新語·任誕篇》云：「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又云：「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恒子野家，謝鎮西往尙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簪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喪禮是爲儒家所最重視的禮法，而其居喪飲酒的行爲是違背禮法的，所以在禮俗之士看來，居喪飲酒的行爲便成爲「宜流之海外，以正風俗」的悖禮放蕩的行爲，但任誕之士照作不無。

至於任誕行爲與服食的關係，某些任誕行爲的具體表現可以說是由於服食後所附帶發生的現象所引發的。《世說新語·任誕篇》云：「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幪衣，諸君何爲入我幪中？』」《世說新語·簡傲篇》云：「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

暇坐。」

如前所述，服食之後，禁忌和後果頗多，其中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即服食忌忍熱；服後發冷時須脫衣，以冷水澆身；又服藥後皮膚幼嫩，容易受擦傷，故須穿寬袍大袖的衣服，不着履而改穿屐，然則，在這種情況之下，服藥者爲了守禁忌而避免後果，像劉伶一樣脫衣裸形，是近乎人情的，因此所謂「脫衣裸形」任性不拘的表現，可以說是由服藥所引發的。服藥對人行爲的影響，其關於任誕者，不僅是脫衣裸形，可能亦與喪禮時飲酒·不哭等等違背禮法者有關。

但是服藥當然不能說是這種任誕行爲表現的充分條件，足能說是其外在因素（即外緣）。假定服藥者無老莊自然思想作爲其精神支柱，任何外緣亦不能使之有如此之表現，因此之故，作爲外在因素的服食雖然對於此種行爲並無決定的作用，而只有引發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完全置之於不顧。後來，在「競以裸裎爲高」（《晉書·范宣傳》）之時，或有未服藥而做出「脫衣裸形」之類任誕行爲者，這是因爲「裸裎」行爲的表現，隨着任誕風氣之盛，也形成一種社會風氣之故。此種缺乏外緣的行爲，與前所說的情形，應該分而爲二，不必混爲一談。

### 3. 任誕行爲的真實意義——反禮教·任性情

魏晉文人名士的任誕行爲所蘊涵的主要意義，在於突破傳統禮法的藩籬。高平陵政變發生後，司馬氏逐漸專權，政權爭奪比以往更加尖銳，對異己分子也更加殘酷。在所謂「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sup>12)</sup>的時代情形之下，有些文人名士採取了撒滅名教的消極反抗行動。他們藐視名教，主張達生任性，把名教與和自然對立起來。<sup>13)</sup>

魏晉時代所謂「名教」是泛指整個人倫秩序而言；所謂「禮法」或「禮教」主要是指在家族倫理的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一套繁文縟節。<sup>14)</sup>故魏晉超名教而任自然的文人名士，在君臣·父子·男女等人倫關係中，常常做出不拘禮法的言

12) 語出於《晉書·阮籍傳》

13) 見孫鐵剛《書生議論——士人與士風》頁一〇九：收於《吾土與吾民》[中國文化新論—社會篇]

14) 見余英時《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頁三三二~三三八：收於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

行，其代表人物爲阮籍與嵇康，正處於名教與自然正面衝突的時代。

阮籍遭母喪而飲酒進肉，散髮坐床，箕踞不哭，是魏晉「居喪不守禮」任誕行爲的嚆矢。《世說新語·任誕篇》云：「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耶？』」阮籍所謂「禮豈爲我輩設耶？」，明顯地呈現出其反禮法·越名教的態度及主張。不但如此，這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的政治態度和意見。《世說新語·簡傲篇》云：「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飲自若。」《晉書·阮籍傳》亦云：

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

阮籍「箕踞嘯歌，酣飲自若」·「作白眼」等傲放無禮的行爲，就是表示其不滿意當時司馬氏的政治陰謀以及向專權者靠攏的禮俗之士。阮籍雖然在表面上作出一些超越名教的行爲，但他內心裏還不肯縱欲肆肆，自甘墮落。《晉書·阮籍傳》亦云：「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可見他自己的行爲放達，却不許他的兒子學他的「放達」。其原因何在？據《世說新語·任誕篇》注《竹林七賢論》所云：「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爲達也。」，則可推而知阮籍的放蕩不羈·不拘禮法的行爲，並非天性之自然，而是有其真實意義與具體目的。因此他的放縱恣肆也還是有個限度。《世說新語·任誕篇》云：「阮公隣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阮籍的放誕行爲，較阮咸的那種「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借客驢箸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任誕篇》）的放誕行爲，則還有個限度。

阮籍雖然在表面上居喪不守禮，但是內心却有強烈的真情，因此他「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爲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世說新語·任誕篇》）如無真情，何致吐血廢頓良久？阮籍的這種內心與態度之間的矛盾，實起於當時虛偽禮教和真正的母子之情不能相應的時代局世之下。他所處的時代，正如漢末諺語所云：「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sup>15)</sup>，是偽孝子·偽禮教·虛詐之弊盛行

的時代，因此他藉悖禮放誕的行為來反抗和諷刺當時所盛行的偽禮教與矯情虛偽的行為。由此可見，其所反對的禮教並非與真情合而為一的禮教，而是以禮代情的虛偽禮教。

魏晉時代，世尚老莊，重視性情之自然流露，藐視禮教。故阮籍以下魏晉之世，「以情代禮」的言行在種種人倫關係上，層出不窮。崇尚自然的人，既以「情」比「禮」更重要，父子之間的關係便不須注重「尊卑」之別，而以所謂「親至」為主。《晉書·胡母輔之傳》云：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為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

兒子直接稱呼父親的字，但父親却不在乎，反而歡笑。此種父子之間的關係足以證明當時重「親至」而輕「尊卑」的情況。<sup>15)</sup>《世說新語·傷逝篇》云：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祕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魏晉文人名士重情輕禮的觀念，推而及於兄弟，也是如此。這些行為雖然不合乎儒家的禮法，但是顯然是至性至情的流露，都可以為王戎所說的「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作註解。《世說新語·惑溺篇》云：「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又云：「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可見魏晉時代重情輕禮

15) 葛洪《抱朴子·外篇》卷十五〈審舉〉

16) 見余英時〈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頁三四二~三四三；收於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

的觀念也表現在夫婦關係上。「卿」字在魏晉南北朝時代是狎暱之稱，與「爾」、「你」、「爾」相似，主要用以稱呼對低於自己或同輩中親暱而不拘禮數者，故當時婦女稱其丈夫為「卿」是不敬，可是王安豐婦之所以「卿卿」，就是因為「親愛」其夫，才不拘禮法的。婦稱夫為「卿」，就是表現在夫婦稱呼方面的「以情代禮」的例證。<sup>17)</sup>

#### 4. 任誕行爲之質變

如前所述，魏晉文人名士的任誕行爲，具有其真實意義與具體目的，藉以表示其對於當時專權者以及虛偽禮教的反抗與諷刺。當時名教與自然正面衝突的情形，有前所列舉的阮籍任誕行爲可得而知。

但是西晉統一以後，名教與自然就轉入調和的階段，出現「名教出於自然」說。因為士族做為當時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它的階級地位是靠名教來維持的，因此，對於其成員中暴露的放誕與禮法的矛盾，必須得到合理的解決，否則便不能維持它的統治。解決方法是約束放誕行爲，使其不能從根本上背棄禮法，而指導這一解決方法的思想原則便是「名教出於自然」說。<sup>18)</sup>「名教」與「自然」之間的調和者，以「中朝名士」王戎、樂廣等為代表。《世說新語·德行篇》云：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晉書·阮瞻傳》云：

瞻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因此，後來文人名士的任誕行爲已經失去具體目的及真實意義，不再是其對現實的反抗與諷刺。他們僅僅為了作名士、得放達之名而做出違風背俗的任誕行爲，純是出於慕倣自炫。《世說新語·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曰：「魏

17) 見余英時〈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頁三四四～三四五；收於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

18) 見孔繁《從「世說新語」看魏晉清談》一文，收於《文史哲》1981年6期。

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此時受風氣影響而放達者，以「中興八達」爲代表。《晉書·光逸傳》云：

尋以世難，(逸)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但是這種風氣並不限於少數「貴遊子弟」，甚至朝廷大臣也都沾染上了。《世說新語·任誕篇》注引鄧粲(晉紀)云：「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顛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作色，有司奏免顛官，詔特原之。」周顛就是「風德雅重」，負海內重望，官至尚書左僕射的周伯仁。像他一位衆望所歸的人物當衆欲通人之妾而露其醜穢，由此可知當時極端破毀禮教的士風之盛。此外，王澄作荊州刺史，送者傾路，澄却脫衣巾而上樹捉鳥，傍若無人<sup>19)</sup>；阮咸與豕共食；畢卓盜酒；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郡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王徽之詣郗雍州，令左右將郗雍州之髡髻送還家；羅友乞食。<sup>20)</sup> 這些名士的行爲，非如阮籍具有反禮法的具體目的，只是追慕風尚而以任誕行爲作名士必具的生活形態，甚至有人由放達而淪爲放狂，給人惡劣的印象。

#### IV. 結言

漢末儒家式微之後，魏晉人士漸漸擺脫只能聽命於君權的社會意識形態。加上老莊之學蔚然成風，更使他們能夠在精神上行爲上越名教而任自然。所以說，魏晉人士如前後時代相比，不僅其自我意識爲前後所不及，而且在個性活動上表現出自己的卓然之處。<sup>21)</sup>

19) 見於《世說新語·簡傲篇》

20) 皆見於《世說新語·任誕篇》

21) 見寧稼雨《魏晉風度》頁一六五。

魏晉文人名士的自我意識以及個性活動的表現之一，就是任誕行爲。而任誕行爲實則與魏晉飲酒·服食之風，密不可分。所以本論文先論魏晉飲酒·服食之風及其原因，針對魏晉飲酒之風，魏晉文人名士之飲酒原因，魏晉服食之風與其原因，服食的禁忌及其附帶現象等諸問題一一疏理。由此得知，漢末始盛飲酒之風，到魏晉竹林名士蔚爲風氣，其目的爲縱情享樂，解憂消愁，逃避現實，保全生命，散發藥氣等等，兼而有之。魏晉之服食風氣，關係到魏晉人士對生命的強烈慾望。再者，服藥的實際效用，滿足他們對「美」的須求，所以服食之風大行於世。

以老莊自然思想爲精神支柱的任誕行爲，多少由飲酒與服食所引發的。魏晉人士狂放的舉止，往往是入醉後的結果。服藥後爲了行散，脫衣裸形等任性表現，亦不能說與任誕行爲完全沒有關係。

總而言之，任誕行爲的真實意義在於反禮教·任性情。無論阮籍具有真實意義及具體目的的任誕行爲，或者阮籍以下出慕倣·受風氣影響的任誕行爲，都是文人名士「清逸之氣」<sup>22)</sup>與「真個性」<sup>23)</sup>在生活行爲上的表現，也是個性解放後精神上要求打破一切桎梏的具體表現。<sup>24)</sup>

### 【參考文獻】

- 楊勇 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明倫出版社，1974  
 劉大杰《魏晉思想論》臺北，里仁書局，1984  
 王 瑤《中古文學史論》臺北，長安出版社，1982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臺北，學生書局，1983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臺北，聯經出版社，1980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臺北，學生書局，1984  
 盧建榮《魏晉自然思想》臺北，聯鳴文化有限公司，1981  
 劉康德《魏晉風度與東方人格》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  
 何啓民《竹林七賢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4  
 李澤厚《美的歷程》臺北，元山書局，1984  
 蘇紹興《兩晉南朝的士族》臺北，聯經出版社，1987

22) 見牟宗三《魏晉名士及其玄學名理》頁六七~七十，收於牟宗三《才性與玄理》

23) 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頁一六八~一七五。

24) 見余英時《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頁三三八；收於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

- 杜正勝 外 《吾土與吾民》〔中國文化新論—社會篇〕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2
- 徐公持 《阮籍與嵇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傅剛 《魏晉風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劉宗坤 《覺醒與沈淪——魏晉風度及其文化表現》 鄭州, 大象出版社, 1997
- 寧稼雨 《魏晉風度——中古文人生活行爲的文化意蘊》 北京, 東方出版社, 1992
- 寥蔚卿 〈論魏晉名士的狂與癡〉: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散文與論評之部〕 台北, 巨流出版公司, 1979
- 張蓓蓓 〈「名教」一詞的產生及其相關問題〉: 《文史論文集》 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5
- 楊美愛 〈「世說新語」新探——從「世說新語」探魏晉之思想社會與亡國〉: 《弘光護專學報》 6期, 1978
- 孔 繁 〈從「世說新語」看魏晉清談〉: 《文史哲》 1981年 6期

### 【國文提要】

중국 역사상 魏晉시기는 政治·經濟·文化·社會 뿐만 아니라 개인의 의식형태에 있어서도 변화가 극심하였던 시기이다. 漢末에 들어 儒家가 쇠미해지자, 유가의 名教를 초월하여 人性에 대해 각성하게 된 魏晉人들은 개인의 본능을 중시하고 自然을 숭상하는 인생관을 지니게 되었다. 이러한 인생관으로 인하여 위진인들은 그들만의 독특한 士風을 형성하게 되었는데, 이러한 사풍이 실제 행위방면에서 체현된 것이 「任誕」의 풍조이다. 任誕行爲는 사실상 魏晉 文人名士 계층에서 유행하던 「飲酒」와 「服食」 풍조와 밀접한 관계를 지닌다. 따라서 본 논문은 위진인들의 任誕行爲와 더불어 飲酒와 服食 풍습을 논의의 범주에 포함시켰다.

먼저 위진의 음주·복식 풍습과 그 원인을 논하고 위진 문인명사들의 음주·복식의 실태와 그 원인을 살폈으며, 복식에 있어서 금기와 부대현상 등 諸問題를 고찰하였다. 한말에 시작된 음주의 풍습이 위진의 竹林名士들에 이르러 크게 유행하였는데, 그 목적은 縱情享樂, 근심 해소, 현실도피, 生命保全, 藥氣의 발산 등에 있었다. 服食의 풍습은 魏晉人사들의 生命에 대한 강렬한 욕망과 관계가 깊으며, 服藥의 실제효용은 그들의 「美」에 대한 욕구를 만족시켜 주는 것이었다.

老莊의 自然思想을 정신적 지주로 삼는 隱行행위는 음주와 복식 풍습에서 유발되는 경우가 종종 있었다. 魏晉人사들의 자유분방한 행동은 왕왕 만취의 결과로 나타난 것이며, 나체를 드러내는 행위는 복약 후에 藥氣를 발산시키기 위한 것이었다.

결론적으로 말하자면, 隱行행위의 眞義는 「反禮教」와 「任性情」에 있다. 隱行행위의 진의와 구체적 목적을 체현한 阮籍이든, 아니면 모방으로 인하여 변질된 隱行행위를 일삼던 阮籍 이후의 인사들이든, 그들의 隱行행위는 모두 위진 문인명사의 「清



逸之氣」와 「眞個性」을 생활행위 方面에서 표현한 것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그들에게 있어 任誕행위는 個性의 解放 이후 精神的인 一切의 桎梏 타파를 요구하는 구체적 표현인 것이다.

【주제어】

任誕, 飲酒, 服食, 魏晉, 文人名士, 名教